

中国古代作家
研究丛书

韩诗编稿

阎琦著

中国古代作家研究丛书

韩诗论稿

阎琦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作家研究丛书

韩诗论稿

阎琦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插页2 字数156,0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统一书号: 10094·520 定价: 0.91元

引 言

汇编于清初的唐诗总集《全唐诗》，收诗近五万首，编为九百卷。在二千余名诗人中，存诗十卷以上者仅十一人，韩愈是其中之一^①。以韩愈诗歌的创作之丰，他的诗理应引起我们较大的重视。当然，创作量的丰歉并不完全代表诗人创作成就的高低；另外，唐人诗歌散佚极多，《全唐诗》所收，也不能反映诗人创作实际数字的多寡。创作量最大的白居易和元稹，是因为他们生前已经自己编定了集子；韩愈自己的文集，是在他死后由升堂入室的弟子兼女婿李汉即代为编定，较少散佚。李白，号称“敏捷诗千首”，“斗酒诗百篇”，诗歌创作一定极丰，可是他和杜甫的诗，到了韩愈的时代，其失散之多，已被夸大成“散落人间者，太山一毫芒”（韩愈：《调张籍》）。可是，从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唐诗研究的对象，只能是这些经过千劫万难留传下来的东西，对大量散佚了的诗作，我们只能无限叹惋地承认它们曾经存在过。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韩愈的诗歌值得花较大的气力去予以研究，是不错的。

韩愈，出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这一年的前六年和这一年的后两年，唐代诗国里的双曜李白与杜甫先后逝世。韩愈一生企慕李杜：“远追甫白感至诚”（《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这是作为诗人的韩愈在诗歌创作上的求其友声，是他攀登诗歌创

作高峰所取的最高模范。唐代诗文兼擅的作家屈指可数，韩愈是其中之一。中唐时期发生了两个文学运动——文章的改革运动和诗歌的改革运动。前一个运动，韩愈是倡其首者，和柳宗元并驾齐驱地成为这个运动的领袖人物；在后一个运动中，以韩愈为首的“韩孟”诗派和以白居易为首的“元白”诗派，是这个运动的中坚。韩诗和韩文，以其卓然的成绩，在当时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宋和宋以后的诗文创作也有深远的影响。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着坚实的地位。自从杜牧《读韩杜集》诗里说了“杜诗韩文愁来读，以情麻姑痒处搔”以后，“杜诗韩文”遂成了妇孺皆知的口号，韩诗后来渐渐为韩文所掩，这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原因。这其实是个误解。杜牧将“杜诗韩文”并列，其意在诗文两方面各树立一个最高的典范，并非只重韩文而轻韩诗。因为就诗论，韩愈之前有两个高峰，单是盛唐的王、孟、高、岑和同时的刘、柳、元、白，都足以与他相颉颃。然而就文论，不但有唐一代无人匹敌，唐之前、汉之后这几个世纪里也无人可匹敌。所以，杜牧虽无心轻韩诗，然而文学史上的事实却是韩诗渐被韩文所掩。这对诗文兼擅的韩愈来说，实在有些不公平道。

宋欧阳修是韩文韩诗并重的，可是他对韩诗也有一个不小的误解。欧氏《六一诗话》中说：“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按“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一联，见韩愈《和席八十二韵》一诗，原意不过是文人嗜酒、怀念朋友，在酒酣耳热之后的一句套话，哪里谈得到韩愈“以诗为文章末事”呢。这又是有意将韩诗附于韩文之末了。韩愈《县斋有怀》诗：“事业寝皋稷，文章蔑曹谢。”他自比曹（植）谢（灵运），并未自比

班（固）马（司马迁），和杜甫的“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一样，主要是诗歌成就上的自诩。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中又说：“……臣于当时之文，亦未有过人者；至于论述陛下功德，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泰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闳休，扬厉无前之伟绩，编之乎诗书而无愧，措之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亦未肯多让。”删去他歌功颂德的谀词，单看他于自己的诗歌，竟是多么自负，绝不是什么“以诗为文章末事”。

北宋以后，因几个主持文坛的大文豪的相继提倡，韩诗和韩文受到格外的重视。但同时就有人持否定态度。这种情况一直进行到近代。仿佛故意唱对台戏似的，愈有人标榜韩诗，就愈有人反对韩诗；有人爱得过分，就有人恶得过分。爱得过分的人，把韩诗与杜诗并称^②，或与李杜并称^③，或李杜韩苏并称^④，或阮陶杜韩并称^⑤，或李杜韩白苏陆并称^⑥；恶得过分的人，却说韩愈于诗本无所解^⑦，是押韵之文^⑧。其中，自然也有持论公平、褒贬恰当的。

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普天下无论贤与不肖，都异口同声地说好，或异口同声地说坏的事是没有的；因为评论者千人千面，立场不同，趣味不同，持论则断难相同。总是有争论，有抑扬。但象韩诗这样，捧之唯恐不高、贬之唯恐不低的却是仅见。千余年来，韩诗在多少个评论家手里，被摩娑着，推崇着，挑剔着，鄙夷着。这未必是件坏事，因为无论褒贬者双方怎样偏激，总要有所依据，有所见解，后一代的研究者则可以从他们的言论中寻绎线索，总结得失，从而得到较合乎事实的结论。

关于韩诗的争论，就这样地一直进行到新中国建国之后，看法也没有趋于一致。可是渐渐地，关于韩诗的研究和讨论几乎停止了，“门前冷落车马稀”。其中的原因，作一点妄猜：是因为韩愈的诗代表了在艺术技巧上刻意创新的唯艺术派或形式主义的苦吟派，总之是明明白白地给韩愈的诗戴上了反现实主义的帽子^⑥。内容上一经否定，也就差不多堵死了韩诗研究的路。这实在是不应当的。近年来，才又活跃起来了，实在是大好事。

注：

①其他十人是：李白（二十五卷），韦应物（十卷），杜甫（十九卷），权德舆（十卷），刘禹锡（十一卷），孟郊（十卷），元稹（二十八卷），白居易（三十九卷），陆龟蒙（二十四卷），罗隐（十一卷）。

②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叶燮《原诗》（内篇）。

③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二）。

④、⑤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九）。

⑥《唐宋诗醇》选唐李杜韩白四家，宋苏陆二家。

⑦陈师道《后山诗话》。

⑧惠洪《冷斋夜话》（卷二）引沈括语。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第十八）引魏泰《隐居诗话》略同。

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编写《中国文学史》上册320页。

目 录

引言	(1)
一 政治诗人韩愈和他诗歌的政治内容	(1)
(一) 韩诗和产生它的时代	(1)
(二) 一个有政治抱负的诗人	(7)
(三) 韩诗的政治内容	(16)
揭露统治阶级和反对藩镇割据、拥护国家统一	(16)
反对佛道二教	(23)
反映“个人失意牢骚”的诗	(29)
反映民生疾苦的诗	(32)
(四) 韩诗的批判和韩诗研究中的偏见	(36)
(附) 关于韩愈的被贬阳山	(52)
二 韩诗奇崛的艺术风格	(65)
(一) 韩诗的基本风格——奇崛	(65)
(二) 陈言务去的语言和奇崛意境的追求	(72)
(三) 戏谑、顿挫、浪漫主义和尚诗胆	(86)
(四) 关于奇崛风格的余话	(97)
三 韩诗艺术风貌的另一领域	(104)
(一) 工稳、清丽的五律、七绝和冲淡的五古	(104)
(二) 阳刚与阴柔艺术的交融	(112)
(三) 写实手段、炼字和写人的功夫、比兴手法	(118)

四 关于韩愈的以文为诗	(136)
(一) 诗歌的发展和以文为诗手法的形成	(136)
(二) 韩愈以文为诗的体现	(146)
多赋体	(146)
以古文章法为诗	(152)
以古文句法为诗	(158)
以议论为诗	(166)
诗兼散文体裁	(173)
(三) 简短的结论	(174)
五 “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	
——韩愈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179)
(一) 柔靡的大历诗风	
——韩诗“大变”的契机	(180)
(二) 韩愈的诗论	
——韩愈改革诗风的胆识	(187)
(三) 韩诗之变	(197)
(四) 韩诗的影响	(206)
后记	(218)

一 政治诗人韩愈和他 诗歌的政治内容

（一）韩诗和产生它的时代

韩愈，字退之，南阳（今河南孟县）人。韩氏郡望昌黎（今辽宁义县），所以世称韩昌黎。韩愈一生，经历了唐代宗、德宗、宪宗、顺宗、穆宗五朝，共五十七年（768—824）。他的仕宦经历和文学创作的时间，主要在德宗贞元，宪宗元和这三十余年间。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发生的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标志中国历史上最繁荣强盛的唐帝国极盛时期的结束。历史上习惯把安、史乱前的唐王朝称为初、盛唐，安、史乱后称为中、晚唐。中、晚唐时期唐王朝政治上和经济上突出的特点是：战乱频仍、民生凋敝、藩镇跋扈、宦官专权和朋党倾轧。这是稍稍熟悉这一段历史的人都知道的。所以，韩愈一生基本上是在丧乱中度过的。曾经如烈火捧干柴、沸沸扬扬的开、天盛世他没有经历过。这使韩愈的政治思想和受政治思想影响的诗歌创作面貌异于盛唐诗人。但是，以韩愈主要活动的贞元、元和时期来说，政局又同时呈现着与晚唐、甚至与中唐前期（肃、代时期）不同的特点。第一，唐王朝平息安、史之乱的

战争基本结束于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唐德宗初年（建中、兴元时期），中央朝廷曾因军阀叛乱而颠沛不安过^①，但到了德宗贞元年间，中央政权与地方军阀有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中央政权虽不能遏制藩镇的跋扈，尚能与之相抗衡。第二，顺宗永贞元年（805），发生了以王叔文、王伾、韦执谊为首，刘禹锡、柳宗元等参加的“永贞革新”，这是中下层地主阶级成员中的有识之士和一群年轻有为、踔厉风发的知识分子发动的一次政治改革运动。虽然这次革新活动很快宣告失败，虽然刚正式跨入仕途的韩愈在这次革新活动中扮演了一个被误解的或被冤抑了的悲剧角色^②，但这次革新仍给韩愈的思想和创作以极大的影响。第三，唐宪宗元和年间，朝廷上下齐心，将帅用命，对割据一方、抵抗王命的藩镇打了几次大胜仗，尤其是元和十二年讨平淮西叛军吴元济的战争，使唐王朝一时出现了所谓中兴的希望。这无异于给韩愈注射了一剂强兴奋剂。第四，为期四十余年的牛、李朋党之争，虽然发端于宪宗元和初年，但此荣彼衰、倾轧愈演愈烈却要到唐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时期，终韩愈一生，他几乎未与党局。以上几点，是我们研究韩愈诗歌创作入手的第一步。我们研究和韩愈同时代的几个杰出诗人如刘禹锡、柳宗元、白居易、元稹、李贺等的诗歌创作，一般也要先把握住当时政治上的这几个特点。

中唐中央政权的衰微，经济的凋敝，统治阶级内部和统治阶级与广大农民阶级矛盾的加剧，使韩、刘、柳、白、元等的诗歌创作与盛唐诗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盛唐诗人，无论是王孟的山水诗，高岑的边塞诗，或是李白独具特色的诗歌创作，那种元气雄厚、刚健俊爽、充满自信的蓬勃向上的格调，在韩、刘、白、元等中唐诗人作品中是找不到的。同时，贞

元、元和时期的政治局势，也使韩、刘、白、元等的诗歌创作与中唐前期，与晚唐时期的诗人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我们先将中唐与晚唐作个比较。晚唐时期，唐王朝内外阶级矛盾日趋严重，唐中央政权的威慑力量，到后来事实上连近在咫尺的京畿地方也达不到，类似于“永贞革新”那样的政治运动和宪宗“中兴”的事情也再无发生的可能。有政治抱负的诗人，想从政局中获取一点大的兴奋剂的希望都落空。晚唐最杰出的诗人杜牧，他的政治抱负和俊爽的诗风只好大半消磨在青楼娼妓之中^③。另一位杰出的诗人李商隐，则终生陷在党争的格局里。今人好用李商隐《登乐游原》中的名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来证明晚唐诗人笔下早已丧失了盛唐诗人恢宏的气度和表现了唐王朝注定灭亡的颓势；韩愈有一首写秋荷的诗，末两句是：“从今有雨君须记，来听萧萧打叶声。”（《盆池五首》之二）这是早秋的荷叶，虽然免不了雪霜摧逼的命运，但眼下仍透着一派生机——这不妨看作是中唐诗人并未丧失自信心的象征。李商隐也有一首写秋荷的诗，末两句是：“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晚秋残荷，一派衰杀景象——这又可视作晚唐诗人丧失最后自信的象征。再来看贞元、元和诗人与中唐前期诗人的不同。中唐前期诗人，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十才子多是天宝时期跨入仕途或开始创作活动的纯才子型诗人，他们先有过一段繁华的经历，安史乱起，遭了乱离，但到了大历时期，唐王朝一获小安定，他们遂又加紧过起华靡的生活，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只是给他们华靡生活造成了一段空白而已。贞元、元和时期的诗坛，为什么能成为唐代诗歌史上第二个鼎盛期？包括韩愈在内的贞元、元和时期的诗人，为什么创作上大都现出与盛唐诗人

遥相衔接而大异于稍前的“大历十才子”的现象？其原因是和贞元、元和之际特定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的。当然，我们也不可忽视杜甫在盛、中唐之间所起的重要的桥梁作用。

韩愈从中国儒家学说里汲取了积极营养（儒家学说中的落后保守成分也给他以很大的影响），使他具有远大的政治理想；贞元、元和之际的特定政治环境，又赋予他企图实现这个政治理想的信心。这一切，使韩愈成为一位政治诗人，使他的诗歌包含着不可低估的政治内容。真正的实干的政治家未必能成为伟大的诗人，但凡有成就的诗人，则非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不可。这是否可以说是一条规律呢？验之以中国文学史，无毫发爽。且以李白、杜甫为例。于唐代前辈诗人，韩愈最倾心李白、杜甫。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艺术上登峰造极的造诣和笔扫千军的成就；一方面是他们都具有非凡的政治抱负。“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应该说同时包含了这两层意思在内。李白的思想极为复杂，儒、道、纵横家……，三教九流，各种思想他都具有。他自比孔子：“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书怀赠南陵常赞府》）自比诸葛亮：“余亦南阳子，时为梁父吟。”（《留别王司马嵩》）还自比管仲、鲁仲连、谢安……等等。他的政治抱负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我们实际考察他的政治才能，就会发现他并没有经邦济世的本领，只好说他是志大才疏，大言托空的狂言者。他的本份只是激愤昂扬的诗人。说得苛刻一些，唐玄宗后来冷遇了他，并没有十分冤枉他，还了他以诗人的本来面目，加给他一个外力，使他走上了中国古代作家“文章憎命达”、“文穷而后工”的老路。杜甫的思想，差不多是醇然的儒家，他“窃比稷与契”

（《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终生都执着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的儒家理想。他没有发出象李白那样多的空言、狂言，但他却比李白更频繁地在自己的诗歌中表述对国家时局的看法，他忠君、爱国，也爱民，他主张统一、减赋税、息兵甲，他常在下层，发现问题非常尖锐，判断形势也非常准确，这表现了他脚踏实地的政治眼光。然而他一旦列身朝官，却几乎毫无建树，至德元年（756）他在左拾遗任上的疏救房琯，说明了他判断是非的实际才能仍然很低下，甚至有只为朋党不顾国家之嫌④。

我们还要把李白、杜甫当作诗人看，而不要当作政治家看。强求诗人同时成为悍杰明睿的政治家，大大多余而且不必要。大言托空的李白也罢，迂阔不切的杜甫也罢，因为他们胸中有这样一种远大的政治理想，使他们的诗歌如同人的血肉之躯有了骨骼支撑一样，能树立，体刚健，并且连带着给他们诗歌的艺术以巨大的提携力量。李白的诗风被认为是“飘逸”的，这是受了他远大向上的政治理想影响所致；杜甫的诗风被认为是“沉郁”的，这是受了他执着、百折不回的政治理想影响所致。由于李白政治理想中有远大向上的积极一面，使他的诗歌基调俊发豪放，使他写出了抨击黑暗现实、追求个性解放的不朽诗篇。如果没有远大向上的政治理想的支撑，李白就成了纯才子浪人式的诗人，他的诗也真成了“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⑤。至于杜甫，更不用说了，他生活境遇每下愈况，但涌向笔端的常是国家大事，人民疾苦，农人樵子，征夫戍卒，诗歌中广阔的社会画面被号为“诗史”。杜甫如果没有这种执着始终的政治理想，恐怕也只有叹老嗟卑，哀病哭穷的份儿了。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概括韩愈一生的事业说：“文起

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整饬的文句和简洁的概括，使这几句话流传很广。苏轼的这四句提要要有夸张溢美之处，但都有案可稽，并不是一味的谰词。四句中，除了第一句谈韩愈文学成就外，其他三句倒是在说韩愈的政绩。韩愈死后，他的朋友张籍写诗祭他，一开始就极力颂扬韩愈的道德、政绩：“呜呼吏部公，其道诚巍昂。生为大贤姿，天使光我唐。德义感鬼神，鉴用不可详。独得雄直气，发为古文章。学无不该贯，吏治得其方……如彼天有斗，人可为信常，如彼岁有春，物宜得华昌。”（《祭退之》）说得似乎比苏轼还过份。一般认为，张籍在道统上属于韩派，他和韩愈的关系在师友之间，但他在诗歌创作上又主要倾向于白居易、元稹，和韩愈常有抵牾^⑥。他这样颂扬韩愈，应该说是十分带偏见的。

韩愈确是一个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诗人。他说自己：“事业窥皋稷，文章蔑曹谢”（《县斋有怀》）；“念昔始读书，志欲干霸王。屠龙破千金，为艺亦云亢”（《岳阳楼别窦司直》）。这一点他和李白、杜甫相同。他的“窥皋稷”、“干霸王”的抱负，和他的经历分不开，也是他从研习儒家经典中得来的，在《出门》一诗中，他曾说：“古人虽已死，书上有遗辞。开卷读且想，千载若相期。”韩愈政治理想的形成和理想的表述，更接近杜甫一些。和李白、杜甫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但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而且是一位实干的政治家（这一点我们后边将要陆续谈到）；他在仕宦途上虽然一再蹭蹬受挫，但晚年毕竟先后作到兵部、刑部、吏部侍郎这样高的职位上，并且十分津津乐道自己这种“玉带悬金鱼”的卿大夫地位（见《示儿》诗）。政治上的实干才能和仕途上的始穷终达使他成为一

名政治诗人，使他的诗歌创作具有较强烈的政治色彩，然而也多少妨害了他诗歌内容上的深厚广泛和艺术上的醇美（这一点我们后边也要谈到）。

（二）一个有政治抱负的诗人

韩诗的内容，一度被说成是反现实主义的，这论断缺乏充足的根据。不能设想一个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诗人的诗歌创作，会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脱离当时的社会政治。

韩愈关于自己不凡的政治抱负的表述是一贯的，但态度上要比李、杜来得急切。这急切通常被人们简单地理解成急切的功名利禄之心，贪名位，佞权贵。首先，对韩愈这样的中下层知识分子来说，兼济天下的抱负和个人的做官得志是联系在一起的，二者不能截然分开；另外，韩愈确有贪名位而不惜巴结权贵的一面，也有为国事民危甘冒生命危险（名位利禄自然早不在话下）的一面。这就要具体考察韩愈一生的经历和行事大端。因为本文只论及韩愈的诗歌创作，要考察韩愈的一生经历和行为，势必要牵连引用他大量的散文著作；而且，关于这些，国内已有不少专著，所以我们就不再辞费了。但是，要认识和研究韩愈这个政治诗人及其诗歌的政治内容，将他诗歌中关于政治抱负“急切”的表述简单作一概述，还是必要的。

韩愈出身中小地主阶层，少年时代是在流离中度过的。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十九岁的韩愈从流寓的宣城（今安徽宣城）来到京都长安，参加进士科考试。他后来在一首诗中回忆自己当时昂扬的志气道：

我年十八九，壮气起胸中。作书上云阙，辞家逐秋

蓬。

（《赠族侄》）

然而他先后参加了三次进士科考试，皆落了选。直到贞元八年他二十五岁时才中了进士。中进士后，韩愈三次试于吏部^⑦，不售，又多方谋干谒，三上宰相书，皆寂无反应，在长安过了相当长一段仰人鼻息、残杯冷炙的生活。二十八岁后，先后为宣武节度使董晋、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幕僚，正式进入仕途，要到三十五岁以后了。这种长期沦于下层的生活，使他较能接近人民群众，对社会现实有较清醒的认识，对他积极、进步的政治理想的形成，具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正式进入仕途之前，韩愈关于其政治抱负的表述，常常是和他急切的入仕心理联在一起的。他有一首《龔龔》诗：

龔龔当世士，所忧在饥寒。但见贱者悲，不闻贵者叹。大贤事业异，远抱非俗观：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沔漈。妖姬坐左右，柔指发哀弹。酒肴虽日陈，感激宁为欢？秋阴欺白日，泥潦不少干；河堤决东郡，老弱随惊湍。天意固有属，谁能诘其端？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排云叫阊阖，披腹呈琅玕。致君岂无术，自进诚独难！

此诗写于贞元十五年在徐州张建封幕时。这一年郑滑大水，河决东堤，百姓罹于水患，境况甚为凄惨。诗中“河堤决东郡，老弱随惊湍”两句，沉痛而酸人心骨。这应该是韩愈写此诗的背景。诗中的“大贤”，是韩愈自指，“太守”指节度使张建封。韩愈置身于太守的宴会上，美酒佳肴列于前，妖姬歌女列